

離
江
出
版
社

聊齋志異評賞大成

編方冊
主馬振上

● 新校

● 全評



● 全譯

● ● 濰江出版社
主編 馬振方

(上)

聊齋志異評賞大成

《聊斋志异》作者 蒲松龄

《聊斋志异》评赏大成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 主 编 | 马振方 | | | |
| 编辑委员 | 马振方 | 马瑞芳 | 刘烈茂 | 任孚先 |
| | 周先慎 | 张稔穰 | 南 原 | |
| 评 赏 | 马振方 | 马瑞芳 | 王光东 | 刘烈茂 |
| | 任孚先 | 李永昶 | 李传瑞 | 杨广敏 |
| | 欧阳世昌 | 罗锡诗 | 范易弘 | 周先慎 |
| | 邹忠良 | 张振钧 | 张稔穰 | 禹克坤 |
| 翻 译 | 子 清 | 南 原 | 鸥 颺 | 凌 虚 |
| 原文点校 | 于世明 | | | |
| 责任编辑 | 聂震宇 | | | |

著名现代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先生为本书题词

對於聊齋志異，我們應當一篇一篇加以
分析評論。因為每篇作品都是一個
有機的藝術整體，各有自己的生命；
我們必須逐篇研究，探求其內在的

精神和藝術特色

吳組缃

一九九〇



本书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马 振 方



《聊齋志異》各種版本

聊齋誌異卷一

。考城隍

宋公諱劇，邑庠生。一日病

請赴試，公言：「文宗未臨，何

病乘馬去，路甚生疎，至一

宮室壯麗，上坐

設几，環各二

筆札，俄進紙

文成，呈殿上。

吳史卷之五

潞令

淄川蒲松齡聊齋著



聊齋誌異卷之二

勞山道士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

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

領，而神光真邁，叩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

「恐矯情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眾，薄暮畢集，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
曰：「為民父母，威福

雖小，任百口誅

起，手足挽亂，似與

蒼中，箭時尋卒，鳴

聲起矣。流毒安窮

鬼能令有一言，握



人物五世

《聊斋志异》人物 作者 戴敦邦



公孙九娘



书痴

蒲松龄故居（山东淄博）



郭沫若题词



编辑出版说明

本书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逐篇评论、赏析。为方便读者，前出《聊斋》本文，后殿白话译文。全书各篇均由本文、评赏、译文三部分组成。

本书的《聊斋》本文以作者手稿本和铸雪斋抄本为主要底本，以二十四卷抄本、青柯亭刻本、同文书局石印图咏本、得月簃丛书拾遗本以及新近面世的《异史》本校补，并参考了张友鹤先生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和朱其铠先生主编的新注本。文字互异者择善而从。全书十二卷，四百九十四篇，另将单见于拾遗本的《蝮蛇》、《龙》、《爱才》三篇编入附录。三会本和新注本都在附录中收入单见于段钰所刻《聊斋志异遗稿》中的《梦狼》附则二，本书据《异史》本将它归入《梦狼》附则正文。

本书评赏文章力求从作品实际出发，有长说长，有短说短，话多即长，话少即短；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知识性、学术性与趣味性，见仁见智，不拘一格；同时力求深入浅出，适应比较广泛的读者。

本书白话译文较多采用直译，辅以意译，少作生发，以帮助不太熟悉文言的读者了解原著。对某些官名、地名或不便翻译的名词、典故，辅以少量简略的

注释。

《聊斋志异》的注本、译本、评本已有多种，有关这部古典名著的论著与日俱增。我们在评赏、翻译、校点中参考、借鉴，受益良多，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本书编就，承吴组缃先生热心题词，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漓 江 出 版 社

《聊斋志异评赏大成》编辑委员会

前 言

马振方

倒数上去三个半世纪，文学史上一代巨匠蒲松龄诞生。四十年后，他所创作的“写鬼写妖”的《聊斋志异》（或简称《聊斋》）初具规模，并开始流行。从那时起，迄今三百一十个年头，这部五十万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代代相传，风行天下，经久不衰，不仅是我国小说名著，并被译为十几种语言文字，成为世界文学的艺术瑰宝。

明清两代，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鼎盛时期，产生八部世界一流的大作品，其中七部都是白话小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唯有《聊斋志异》用文言写就，这不能不为它的传播造成障碍。然而，在浩如烟海的小说之林中，《聊斋》是个独特的存在，不仅是中国文言小说的扛鼎之作，也是古代短篇小说的艺术高峰，是神话幻想与现实理想的艺术奇迹。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鉴赏这部奇书，对它的研究、评论也日趋繁荣和深入。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先生多次说过：对《聊斋志异》，只作综合的研究、评述还嫌不够，还要一篇一篇地评。我们编写这部《聊斋志异评赏大

成》，就是试着做这件事，并用以纪念蒲松龄诞生三百五十周年。

—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蒲家庄人。他生于崇祯十三年。四年后明即灭亡，清兵入关，建立新的王朝。这位小说家的成长、活动是在清前期的七十年间。他出身于“书香继世”的家庭，自幼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一心读书应考，走仕进之路。但才华横溢的蒲松龄对科第举业要求的八股文不很适应，十九岁时受到当时任山东学政的诗人施愚山的赏识，“以县府道三第一”考取秀才，以后就屡试屡败，难以进身。他的父亲蒲槃弃儒经商二十年之久，创起一个殷实的家业，后来“周贫建寺”，坐吃山空，又败落了。到蒲松龄二十几岁，兄弟分居，已相当贫困。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在几年后就不得不到缙绅家设帐授徒。三十一岁那年，应同乡进士孙蕙之请，南下宝应、高邮，为这位知县做了一年幕宾，回乡后继续教书和应考的生涯。他先在丰泉王家，后在西铺毕家，前后坐馆四十余年。在毕家时间尤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应考大约到六十几岁，始终未能中举，直到七十二岁闲居在家，才被援例拔为岁贡生，四年后就去世了。

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有志难酬，这对他的打击极大，对其思想与创作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甚至有某种决定的意义。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唯一的道路就是博取功名，出任做官。蒲松龄积极入世，热心进取，自然为了个人前途，荣华富贵；同时也是想做一番事业，济世利民。一次次失败使他满怀抑郁不

乎，慨叹“仕途黑暗，公道不彰”，甚至“气愤填膺，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与韩刺史樾依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力“搜抉奇怪”，寄情狐鬼，写出他的“孤愤之书”。《聊斋自志》中所谓“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充分表达了作家的这种创作心境。不过，《聊斋》抒写的“孤愤”决不只是个人遭际引发的愤激之情，而有广泛、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性。对蒲松龄来说，伴随科场失意而来的是穷困潦倒，是大半生寒热仰人的坐馆生涯。他集中写作《聊斋》的三十岁到四十多岁的十几年间尤其艰难，以至到了“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的地步。这使他身处下层，接近民众，了解、同情民间疾苦，对官场的腐败、现实的黑暗、豪绅的横行不法、社会的恶劣世风，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和斗争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也”（《与韩刺史樾依书》）。这是他的又一种“孤愤”，是愤世嫉俗、伤时忧民的愤激之情。如此看来，《聊斋》寄托的“孤愤”决不是达官贵人、富绅巨贾所具备的，而是既富正义感又落拓不得志的穷秀才所独有的，是蒲松龄的身世、阅历和所受教育的自然产物，《聊斋志异》则是这位困顿终生的作家生活、思想的艺术结晶。

南游做幕是蒲松龄唯一的一次远行，时间虽只一年，却是他一生经历的分水岭，是他久困名场之后，对仕进之路失去信心、感到失望的结果和表现。他决心走出应考的书斋，走向社会与人生，并开始广泛搜集题材，自觉从事《聊斋》的写作。蒲松龄开始记录怪异传说的时间大概还要早些，但那多半出于兴趣和爱好；把《聊斋》作为寄情抒怀的“孤愤之书”来大力创作，匠意经营，则始于离乡南游前后。他在一首南游诗中这样

写道：“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尽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即呈孙树百、刘孔集》）这不仅表达了当时的心境，也是他把写作鬼狐故事作为消解、宣泄胸中磊块的有力证明。

当然，《聊斋志异》并非篇篇都有寄托。“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蒲松龄通过多种途径搜采民间怪异传说，“闻则命笔，遂以成编”，长年累月，乐此不疲。虽然有时也感到与科举考试相矛盾，写出过“鬼狐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的诗句（《同安丘李文贻游大明湖》），却始终没有认真实行，直到老年还在搜奇抉怪，为《聊斋》谱写新篇。此乃这位小说家天性使然，也是成就这部奇书的重要因素。如此产生的《聊斋志异》，不同篇章的创作情况有很大区别，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忠实记录传说，只作文字加工。这一类篇数不少，但篇幅很短，因而不是主要部分。其二，有民间传说做基础，经过蒲松龄大力改造和生发，把神怪传说现实化、理想化，造成各种有分量的小说佳作。其三，根据现实题材进行创作，其中神异幻想部分也是蒲松龄的艺术造作，是现实、理想的神话化。后面两类作品，篇幅大多较长，价值、是成就也多高于第一类作品，是构成这部奇书的主体，也是精华的主要所在。

二

《聊斋志异》的价值和地位，需要放在世界小说之林中加以考察，放在小说艺术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评判。

中外古今的小说分为两大形态：拟实类和表意类。前者以人生世事为蓝本，内容须合现实的逻辑，以生活本身的样态反

映生活,传达作家的识见、情感和理想;后者以表意为旨归,内容是超验的,非现实的,或是现实的变形变态,以奇思异想为意念、情感、精神或特征营造幻诞的形象结构,表现作家的生活感受和真知灼见。《聊斋志异》近五百篇,虽有一部分拟实之作,大多还是写鬼写妖的表意小说。这类小说源远流长,除去上古神话不论,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的法师幻术故事即是它们的最早作品,迄今已有四千年之久;到新王国时期,幻异故事有新的发展,产生了篇幅曼长、情节曲折的《两兄弟故事》;再后有希伯来人《旧约全书》中的神话故事。所有这些都是民间传说的自然状态。自觉创作神异幻想表意小说并取得显著成就的是古希腊人,是公元二世纪作家琉善和阿普列乌斯,前者的《真实的故事》和后者的《金驴记》都是奇幻的讽喻之作,是相当成熟的中长篇表意小说。其后则有我国的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中《离魂记》、《柳毅传》、《任氏传》等一批神异的人情小说。与此同时,在阿拉伯国家产生了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其中一部分也是超验的神话传说;在日本产生了被称为物语之祖的《竹取物语》,是写神女下凡的幻想故事。从十一到十五世纪,东西方继续产生不少神怪故事和幻异小说,我国宋、元两代及明前期的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有神鬼、灵怪、幻术等类作品。统观上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神话幻想表意之作,各有各的特点、造诣和艺术成就,但都未达到这类小说的艺术高峰。它们的高峰出在十六、十七两个世纪,那就是吴承恩的《西游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前者是长篇的高峰,后者是短篇的高峰。两者在各自的领域把神异幻想小说艺术发挥尽致,达于极顶。以后虽也出现不少同类作品,但或为东施效颦,或属强弩之末,无法与两作同日而语。陈廷机称《聊